

不做「帝王粉」 讓旭彬：更願與百姓共情

讓旭彬對歷史的深入研究既談不上興趣，也不是愛好，更多的是困惑。「越流行、越習以為常的結論越不敢輕易相信。」對於讓旭彬而言，研究歷史的意義就在此——重構歷史事件的邏輯鏈條，可以讓人體會到一種掙脫灌輸與桎梏的自由。因此，當互聯網上，有人視朱元璋為「我家重八」時，讓旭彬無法與這樣的帝王們共情，「我自己是一個老百姓，我更關注底層老百姓在他們治下過着怎樣的生活，以及為什麼會過着這樣的生活。」於是，與底層百姓共情的新書《活在洪武時代》就這樣誕生了。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蕊

讓旭彬，男，青年作家，湖南人，原為騰訊歷史頻道主編，對歷史有着深入的研究，頗有心得，在多家媒體上發表過歷史類文章。主要作品有《秦制兩千年》《短史記》《中國1864—1911》《漢朝——被掩蓋的真相》《權力臉譜》等。

他的新書《活在洪武時代：朱元璋治下小人物的命運》於今年7月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本書將洪武帝朱元璋在《大誥》中寫到的12個案件抽絲剝繭，詳盡地闡述了這些毫無法理、常識和邏輯的案件背後的來龍去脈。從明初的軍事、土地、政治、法制等政策制度入手，梳理涉案人員的行為動機，解讀洪武帝審案和判決的依據及目的，從而勾勒出洪武時代各色人物的荒誕命運以及可怖的生存狀態，再現了洪武帝「重典之治」的本來面目。

重新檢視「最冷門IP」

學者楊早將一些知名度高的古典作品，稱為古典IP，比如《西遊記》，改編重寫的作品無數，經常被人說成是中國最大的IP。最近熱播的《夢華錄》，因為故事脫胎於關漢卿的劇作《趙盼兒風月救風塵》，也被稱為古典IP的重寫。而在他看來，《大誥》是古典IP中最冷門的。

《大誥》是朱元璋用了兩年時間親自寫定的「重大刑事罪案啟示錄」，用意在於警示官民，重典在前，不要重蹈覆轍。史書上定義《大誥》為「刑典」，但它跟《大明律》不同，不是成文法，而是判例匯編。在洪武時代，《大誥》每家必須有一本，有者犯罪減刑，無者加刑甚至流放海外永不令歸。

讓旭彬為何選了最冷門的IP來研究呢？他在「雲」做客天一文化講壇，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表示有兩方面的原因，「第一，這些年讀到過一些論文與專著，發現它們常直接引用《大誥》的內容，不假思索地接受朱元璋的敘述，然後以之來說明、分析洪武時代的種種現象。我覺得這種做法有點問題。畢竟，《大誥》究其實質乃是一種宣傳品。第二，這些年也讀到過一些通俗明史讀物，有些還相當流行。這些讀物大多有個共同點，就是熱衷於講述朱元璋這樣的帝王如何英明神武、雄才大略。在這種敘事模式的影響下，對四編《大誥》的認知也發生了微妙的變化。許多人覺得《大誥》裏那個宦官如仇、嫉吏如仇、嫉富如仇的朱元璋是真實的，值得頌揚和尊敬。」

讓旭彬認為，被帝王的宣傳話語帶跑，與帝王的雄圖霸業共情，這是歷史寫作的歧路。所以就有了這本以四編《大誥》中的小人物為主角的

《活在洪武時代》。「我希望通過這本書，跳出朱元璋的宣傳話語，勾勒出洪武百姓遭遇悲慘命運的真實邏輯。」

書寫小人物 還原案件本來面貌

讓旭彬強調，新書的主角不是朱元璋，而是朱元璋四編《大誥》筆下的那些「洪武愚頑」。所以，書裏沒有帝王將相們的雄才大略，只有被統治者們的輾轉騰挪。

「愚頑」和它的同義詞「頑愚」、「頑民」與「姦頑」等，是四編《大誥》裏極常見的詞彙。在朱元璋的語境裏，「洪武愚頑」指的是那些生活在洪武時代、既愚蠢又頑固、不肯接受朝廷教化的「不合格的被統治者」。他們遍布在洪武時代的各個角落，其身份可以是官員、胥吏與兵卒，也可以是農夫、商賈、工匠與讀書人，甚至還包括僧侶與道士。

然而，《大誥》中的許多案件，除了朱元璋提供的「事實判斷」之外，已很難再找到更多的直接史料。畢竟，這些案子的主角只是普通的底層百姓，本就不屬於舊式史學的記錄對象。讓旭彬為了對案件「重審」，選擇了從補足時代背景的角度入手。

「為了維持謊言，就不得不撒更多的謊。這是所有政治宣傳品無法迴避的通病，《大誥》自然也不例外。」讓旭彬反覆通讀四編《大誥》，「只要反覆通讀，就很容易發現朱元璋的敘述經常發生矛盾，無法自圓其說。要針對約兩百個案子將謊言說得天衣無縫，再如何天縱英才，也是幾乎無法完成的任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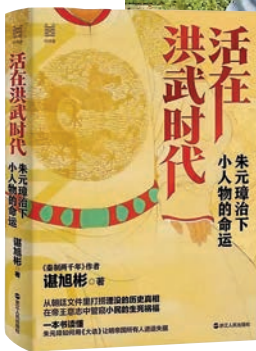
而且，儘管《大誥》裏提及的許多小人物在別處完全找不到蹤跡，儘管他們的名字和遭遇被朱元璋記錄下來純屬偶然，但這些小人物所陷入的困境，在洪武時代往往不是個案，而是現象。「是現象，就可以通過補充其他相關材料來補足歷史背景，重構邏輯鏈條。」

唯一「迎合受眾」的是寫作力求通俗

讓旭彬對歷史的研究與角度的選擇從來不是因為個人喜好，「我不鍾情中國歷史上的任何朝代。我思考與寫作的慣性是『反思』。」在他看來，總結歷史與傳統中有多少好東西的研究和通俗寫作已經很多，這類研究與寫作造就了許多「朝代粉」「帝王粉」。在互聯網上，有人擁護李唐，有人歌頌趙宋，也有人迷戀宋明；有人喊秦始皇「政哥哥」，有人呼唐太宗為「國民」，也有人視朱元璋為「我家重八」。而讓旭彬直言自己不喜歡這類東西，無法與這



◆讓旭彬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受訪者供圖



◆《活在洪武時代：朱元璋治下小人物的命運》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受訪者供圖

些帝王們共情，也無法與他們的朝代共情。「我更關注底層百姓在他們治下過着怎樣的生活，以及為什麼會過着這樣的生活。」

他甚至自嘲道，自己在「迎合受眾」這件事情上，大概是完全失敗的，「各路朝代粉、帝王粉、傳統文化粉皆對我們不滿。甚至於『明粉』前一天剛剛罵完我們是『清粉』；後一天『清粉』又跑來罵我們是『明粉』。」

讓旭彬說，唯一值得提的「迎合受眾」之舉，是他對寫作的要求是盡力保證通俗，盡力確保讀者即便沒有多少歷史常識方面的積累，也可以無障礙地讀懂文章。

「臧往以知來」回歸歷史常識

對於各種平台上不時出現的關於某些歷史人物或者事件的「情緒化」表達，讓旭彬並不認可，他一直主張要回歸歷史常識。

讓旭彬說他一直很信服前輩史家呂思勉先生的一段話。呂先生說：「研究歷史，有一件最緊要的事情，便是根據現代的事情，去推想古代事實的真相（根據歷史上較為明白、近情的事情，去推想糊塗、荒誕的事情的真相）。這麼一來，自然見得社會上古今的現象，其中都有一個共通之點。得了這種原則公例，就好拿來應用，拿來應付現在的事情了。所謂『臧往以知來』。歷史的用處，就在這裏。倘使承認了歷史上有一種異乎尋常的人物，譬如後世只有操、莽，在古代，卻有禪讓的堯、舜……那就人的性質，無從捉摸；歷史上的事實，再無公例可求；歷史可以不必研究了。」

這段話當中，讓旭彬感觸最深的，是「根據歷史上較為明白、近情的事情，去推想糊塗、荒誕的事情的真相」一句。這是呂先生基於對史料的揣摩、對現實的認知和對人性的體察，而得出的經驗之論。「我覺得回歸常識的關鍵。其實，呂先生是在鼓勵人們自現實中更深刻地理解歷史，在歷史中更深刻地理解現實。」

傳奇教練雲加的故事

差不多20年前的一個星期一早上，我在現在倫敦大學學院醫院西北角對出的紅綠燈等待過馬路。突然看見一輛車頭掛着阿仙奴足球隊標誌盾牌的豪華房車減速準備轉彎。該車在我面前經過時，我豎起了大拇指，但並不期待會得到什麼反應。想不到車內一位先生不但看到了我，還向我投以微笑，亦向我豎起了大拇指。一切都發生在電光火石的瞬間。

你也許猜錯了。車內的那位先生，並不是執掌阿仙奴（內地譯阿森納）達22年的法國傳奇教練雲加（內地譯名溫格），而是雲加的貴人、其時球會的執行副主席大衛·甸恩（David Dein）。甸恩於1996年偕阿仙奴另外兩位董事遠赴日本，邀請其時為名古屋八鯨隊（現名古屋鯨魚隊）教練的雲加執掌阿仙奴，結果雲加為球隊創造了令人津津樂道的輝煌歷史。

上世紀90年代末、2000年代初是英格蘭足球風起雲湧的時期。在英國歷史上，足球一直是基層的運動：球迷毆鬥和醉酒鬧事，環繞的都是足球而非網球和板球等富人運動。足球亦是非常具地域性，與社區身份有緊密聯繫的運動，而不是一盤國際性大生意：哪怕你的本地球隊有多糟糕，你也會支持；你並不會對其他隊伍的球賽有什麼興趣，無論他們踢得多漂亮——除非他們的比賽跟你的球隊有直接利害關係。球會是個大家庭，球會副主席會向途人豎大拇指。球員只是普通人，而不是土豪和明星：你在路上、酒吧和餐廳都可以碰到他們。最後，足球也是英國人的運動：球員大部分都是英國人——英格蘭人、蘇格蘭人、威爾斯人、愛爾蘭人——外國人寥寥可數，而超級聯賽沒有任何外國教練。這一切一切，都在這個時期開始改變。

雲加的任命極具標誌性，因為他甫上任便引進了一套英國前所未見的訓練方法：從球員飲食與

心理健康到練習場地條件，他都嘗試用科學方法分析和解決。他亦善於發掘世界各地有潛質的年輕球員，把他們迅速培養成為身價翻數倍的球星。他的宿敵、曼聯的蘇格蘭教練費格遜在他抵埠後不久便說：「這個雲加完全不懂（我們）英格蘭足球的傳統，他來自哪裏？日本。他應該多觀察和學習，他應該閉嘴。」結果雲加執掌阿仙奴的第一個完整球季便教「費爵爺」閉嘴了——之前的多年英超（英格蘭超級聯賽）冠軍曼聯竟敗給一個「不知從哪裏來的法國人」而屈居第二。

阿仙奴與曼聯其後的激烈競爭（包括曼聯在翌年奪得冠軍、阿仙奴於2003至04年連續49場比賽不敗創下整個球季不敗的創舉、阿仙奴球員幾近群毆「出千」的曼聯前鋒雲尼斯達萊、兩隊隊長韋拉與堅尼的仇怨，以及阿仙奴的不敗紀錄在具爭議性的情形下被曼聯終結後，17歲的阿仙奴中場球員法比加斯向費格遜投以披薩等）現在已成佳話。原因之一是雖然英超足球已開始因全球電視直播收視而日趨商業化，但巨額外資進駐球隊、資本足以左右聯賽成績的情景尚未發生，而球隊教練對球會各方面的運作仍有無上的決策權。雲加在自傳中表達了對那個他有份改寫的「純真年代」的深厚感情，並慨嘆現在英超的變味。他也不避諱自己對英超帶來的影響：於2005年2月的一場比賽，阿仙奴成為了英超首隊「正選11人皆沒有英國人」的球隊，但他覺得（他當然會這樣覺得）他只是用人唯才，而出色的外國球員成為了年輕本土球員的榜樣，為英格蘭造就未來人才。

自傳卻只有不到一半的篇幅談阿仙奴。標題《我的紅白人生》好像取自阿仙奴的球隊顏色，實則不然——雲加執教過的球隊（除了阿仙奴，



書評

文：李雅言

《我的紅白人生：溫格自傳》
作者：阿爾塞納·溫格
譯者：顏強
出版社：金城出版社

還包括了法國南錫、法國摩納哥與日本八鯨）原來都是紅白色的。雲加最大的成就也許出現於世界舞台，但他其實卻來自樸實的鄉村小鎮，而他把他的成功要訣——觀察入微和勤奮——都歸功於自己的出身。全書平實而誠懇，沒有戲劇性的描述（書中冷靜地敘述煽情傳媒控告他戀童一事），沒有對手的攻擊和閒言閒語，讓人感覺在同時讀雲加的個人故事、歐洲上世紀下半葉歷史，以及近代足球發展史。

雲加引述一位他沒提名字的塞爾維亞球員的故事：在物資極貧乏的時候，球員的叔叔送了一個新的足球給球員。球員為了不弄髒這個珍貴的球，和哥哥只會用頭頂球而不讓它着地。球員之後被貝爾格萊德紅星隊的天星看上，就是因為小時培養的頭部控球技巧。雲加會被這些樸素的故事感動，覺得跟他的兒時經歷很像，但他卻又是「現代足球」的創作者，致力設計出「最好的訓練條件」。像他的故事，「二戰後」在各行各業皆屢見不鮮，商界尤其多的是。若然經歷過苛刻的條件才會成才，社會未來的人才將會從何來？

可以想像的是，此書的讀者大多是為了理解阿仙奴光榮事跡是如何建立而讀的。對了，兩個素未謀面的阿仙奴擁護者豎大拇指的那一天，應該是4月22日：球隊之前一天2比0勝萊士域治之後重奪聯賽榜首位置，12天後贏得足總杯，16天後作客曼聯取勝再奪聯賽冠軍，同時創下全季作客不敗的紀錄。

緣起香港：張愛玲的異鄉和世界

作者：黃心村
出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1939年，未滿19歲的張愛玲入讀香港大學，兩年半後親歷了香港之戰和淪陷。帶着香港經驗「切身的、劇烈的影響」，她回到上海開始寫作，以一系列「香港傳奇」一躍成為炙手可熱的新銳女作家。《緣起香港》聚焦張愛玲與香港的淵源，以檔案資料為佐證，還原模糊的歷史影像，釐清一段戰亂時期的人文經驗。張愛玲貫穿一生的世界主義視源自大學時代的基礎人文教育。港島山上或澄澈或濃烈的視覺印象，砲火下密集的閱讀經驗，多語言和多文化參照系的匯流，殖民現代性的紛繁呈現，以及戰後從香港重新出發的漫長的漂流生涯，都刻在她寫作生命的基因裏。張愛玲的香港經驗直指內心深處的清冽和柔軟，更有一種尖銳和酷烈，構成她文字中最震撼的靈魂。

城市如何文化

作者：茹國烈
出版：中華書局(香港)



城市是什麼？文化是什麼？城市如何文化？本書探討城市文化，提出「文化系統」、「文化指數」、「文化地圖」及「文化空間」等概念，解構城市文化的各種要素。作者選取了十四個著名城市，深度考察它們怎樣成為獨特的文化都市。最後，作者走訪香港各區，探索各自的文化特質，對香港未來的城市文化發展規劃提出建議。香港如何「文化」？讀者可以透過本書，與作者共同思考未來香港的城市文化發展。

天使時代：劉慈欣中短篇科幻小說選II

作者：劉慈欣
出版：香港中和出版



本書收錄八篇劉慈欣中短篇作品，包括中國科幻銀河獎得獎作品《鏡子》，銀河獎讀者提名獎《人和吞食者》《詩雲》，「末日三部曲之二」的《微紀元》，以及渴望飛翔的《天使時代》等。有鏡像世界中運算得知的未來，有無意改變了歷史致引人類歷史走向的轉變，有後太陽系時期人類生存的掙扎與探索，也有基因改造對於生存與倫理的探討。不同的作品，共同指向的，是關於人類與文明的存續。

簡訊

法國插畫家桑貝逝世 享壽89歲

法國插畫家桑貝（Jean-Jacques Sempé）創作《小淘氣尼古拉》、《馬塞林為什麼會臉紅？》（Marcellin Cailou）等書，在全球都備受喜愛。他於8月11日逝世，享壽89歲。



◆法國著名插畫家桑貝於2022年8月11日去世。法新社

桑貝1932年在法國西南部城市波爾多（Bordeaux）附近的培薩克村（Pessac）出生，是他母親與僱主的私生子。他原本住在一個會施虐的寄養家庭，後來母親帶他回家，但也對他暴力相向。他記得母親對他說：「過來一點，我會很用力賞你一巴掌，讓牆壁把你反彈回來。」他們母子與酗酒的繼父一起生活。桑貝一輩子都不認識自己的生父。他曾說，這讓他「不知道自己是誰、又何以立足」。

桑貝原本想成為爵士鋼琴家，但無奈童年坎坷，他14歲就輟學，之後謊報年齡，加入軍隊。然而軍旅生活也不算順利，他開始將畫稿出售給巴黎的報社。在一家媒體工作時，桑貝認識了漫畫界傳奇人物、《阿斯泰利克斯歷險記》（Asterix）作者之一葛西尼（Rene Goscinny），兩人於1959年共同創作出《小淘氣尼古拉》（Le Petit Nicolas），該書描繪1950年代在法國的理想化童年，多年來暢銷國際，在45個國家售出超過1,500萬本，也被改編成熱門電影和動畫。

桑貝曾於2018年說：「尼古拉的故事是一種回溯我成長過程中經歷的悲慘生活、同時確定苦惱甘來的方式。」

但這些故事於1959年剛問世時並未引起廣泛注意，桑貝必須持續向報社兜售畫稿才能維持生計，他後來形容自己早年的職業生涯「相當悽慘」。直到1978年，他被《紐約客》僱用，才終於開始了事業長紅。他說：「我都快50歲了，人生才第一次感覺自己存在！我終於找到自己的歸屬。」

桑貝經常用柔和線條描繪出遑闊的世界，其中的人物卻小小一個，他揭示了這個世界有趣、時而諷刺的真相，但從不嘲弄。桑貝在繪畫題材中展現的良善，與他自身的悲慘成長經歷成了鮮明對比。他在數十年間避談這個話題，直到80歲左右才透露端倪，說：「童年是沒辦法釋懷的。想要整理思緒、美化回憶，但永遠無法釋懷。」

桑貝很多年來都不承認自己有才華，而是將成就歸功於努力和犧牲。他說，他可以花費3周時間把一幅作品畫好，為了準時交件，要他做什麼犧牲都可以，包括「不洗澡、不睡覺」。

法國總統馬克龍（Emmanuel Macron）在Instagram上說：「爵士樂，溫柔的諷刺，細膩的智慧……我們對桑貝永難忘。」

◆文：中央社